早期天地会结盟仪式及其象征意义

宋 军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secret society, Tian Di Hui had a series of joining rite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rite included: Setting altar; Swearing by walking beneath knives; Smearing the blood as a sign of the oath; and dictating finger codes, poems and secret signs. With the proceeding of the time and enlarging of spreading region, the joining rite graduall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By a series of symbolic means, Tian Di Hui impelled new comers to depart consciously with their own past and became its members; meantime formed and reinforced its control over its members to keep secrets, and obey action and thought regulations. All of these were extremely effective to integrate this secret society. Furthermore, the institutional joining rite and its symbolic implications are not Tian Di Hui's own peculiar and isolat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comparing it with its counterpart of Freemason, it is clear that joining rite is universal in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sense.

结盟仪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秘密结社之中，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自从有史以来，便与“秘密”结下了不解之缘，正象阳与阴、明与暗、上与下等诸多二元的统一相同，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它的公开与隐秘，二者相互依存，无法分离。德国社会学家金美尔称之为“第二个世界”。而主要存在于这一隐秘世界中的组织与团体，便被称为“秘密结社”，结盟仪式所具有的意义则在于加深加入者与非加入者之间的区别，使新来者为了超越这一断层，有意识地接受象征性“死亡”的考验，最终获得诸多秘密结社各自憧憬的“神圣世界”在哲学、目的或世界观上的启示。〔1〕据有关学者在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秘密结社的结盟仪式的基础上，发现其存在着三大共性。即①参加者必须承担保持沉默的义务；②为参加仪式而净化身心；③经受并克服“死亡”的考验。〔2〕

本文将以上述秘密结社结盟仪式的共性为基础，对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展开论述，以探讨其发展演变及其深层结构上的象征意义。

一、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及其嬗变

天地会又称洪门，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其起源诸说，如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郑成功创立说、乾隆二十六年说、乾隆三十二年说、“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说等，已达十二种之多，其中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创立一说最

具说服力。天地会成立不久，便迅速扩展到广东、台湾、江西、广西、贵州、云南、湖南诸省，参加者主要为肩挑负贩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部分农民等，天地会以三点会、三合会、添弟会、小刀会等名称活跃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会党，其性质也逐渐由以互济互助为目的的民间异姓结拜组织转变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政治结社，在清代历史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纵观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可知其有着一个由简而繁、逐渐完善的过程，且基本要点始终贯彻如一。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创立天地会后，便于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该地收卢茂、陈彪、方劝、李少敏等人入会，传授"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3〕"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升]天朱李洪"等隐喻天地会起源的诗句；"五点二十一"即"洪"字暗号；"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众人"穿刀设誓"，保守会中秘密。〔4〕尽管与后世相比，天地会创立之初的结盟仪式虽然显得有些简单，但基本要点：隐语诗句、会诀暗号、订盟设誓却尽在其中。此后，随着天地会的传播，各地组织在其基础上或增添内容、或略加变通，无不以之为蓝本。

乾隆三十三年(1768)，提喜的弟子卢茂在该师的暗中指使下，以宋代后裔赵良明的旗号聚众起事，事败被俘者达三百余名。然而，他们却严守会中机密，不但未供出"天地会"名目，就连入会仪式也只简单供为众人"拜神结盟"，"同饮香灰酒齐心"。〔5〕而仅在两年之后，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明后裔朱振兴名义起事的李少敏亦未泄露会众机密。正是由于这些天地会骨干严格履行了结盟拜会时的誓言，且经三十三、三十五年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以提喜为首的天地会暂时停止了活动，致使官方在其创立后近二十余年间，对天地会的内部情况所知甚少。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提喜病逝，天地会才再度开始活跃起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天地会骨干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自广东惠州府至福建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其传授暗号，只是吃茶吃烟俱用三指。如有人问及有无兄弟，答左右俱有兄弟，便知是会中人"。〔6〕乾隆四十七年(1782)，陈彪传漳州严烟，称"凡要入这会，须设立香案，在刀剑下鸣誓，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家出力，公同帮助。又恐人数太众，不能认识，相约见人伸三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7〕次年，严烟东渡台湾，在该地引人入会，作法与陈彪所传相同："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立簿"。此外，尚传该会起源传说及"五点二十一"隐语。〔8〕显而易见，二十余年后的天地会成员，已不象其成立之初的殉难者那样严守会中机密，清政府从被俘者的口中，越来越多地获取了远远超过其表面行为的内部情报。这一趋势在乾隆帝受到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兵攻占台湾的刺激而下令不遗余力地追查天地会起源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显。

乾隆五十一年(1786)，福建漳州及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为令入会者烧香，并与引进者同拜天地，立誓"如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随后传授指诀暗号，即"只用手指三个按住心坎"或"举大指为天，小指为地"，吃烟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触破机关走不可，忠义存心不可忘"等诗句。〔9〕而据饶平县的另一支天地会被捕会员供述，其入会仪式除了会内传说及诗句外，尚"用桌子供设香炉，把剑两把义[叉]插地下，叫小的由剑下走过，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并教小的用三指接递茶烟，如路上有人抢夺，把三指按住胸膛，即可无事"。若人查问，"只说水里来三字，便知同会"。〔10〕

乾隆五十五年(1790),客居台湾彰化的福建漳州人谢志、张标复兴天地会,"所邀之人,要有凭据给与。谢志交给图书一方,并称凡有入会之人,将图书印信纸片一张,以为凭据"。"图书上刻福、忠、兴、万、合、和六字"。结拜时"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谢志拿出誓章一纸,称系从前天地会旧誓,张标同吴顺光等在神泉[前]跪读毕,将誓章在神前焚化,张标与众人歃血酒。谢志又称,会内之人相见,左手伸三指朝天为暗号,这是从前天地会的旧记号"。〔1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则有关谢志、张标结拜天地会的史料中,首次披露了该会尚存在旧有结盟誓章。据谢志称,该誓章为林爽文会内陈信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起义失败后,在其家躲避时所携,大致内容为令诸会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12〕林爽文所属天地会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严烟所传,而严烟又为天地会始祖提喜的再传弟子。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所谓天地会旧有的结盟誓章,极有可能是天地会早期的秘密文件之一。但也没有证据说明它不是林爽文会内的产物。在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林爽文起义的诸多史料之中,保存着一份清政府查抄的《天地会盟书誓词》残件。中有"本原异姓,缔结全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视同一家,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跟机,含血喷天,全家灭亡。自今既盟之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犯□相扶"。〔13〕从内容上看,它与谢志所见誓章似无二致。由于清政府对拜盟结会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取缔政策,故大多数天地会组织仅以口传的形式发愿立誓,并不写帖立簿。这篇盟书誓词的存留,为我们了解早期天地会结盟仪式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原籍福建晋江客居台湾彰化县的施兰,为给罹难于林爽文之役的兄长施斐报仇而结拜天地会,被捕后供称:"我排列香案三牲酒醴,又把米斗盛米,插了两把半斩刀,一同拜天立誓,不可走漏风声。如有背心,必遭杀戮。赌咒已毕,宰鸡一只,把鸡血滴入酒内,和众人分吃血酒。又用铜钱一个,钱边凿了两痕,挂在胸前做暗号"。〔14〕其中"米斗"一项为前所未见,似开日后天地会结盟仪式中此项神秘陈设之先河。

纵观乾隆年间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可知其在创立之后的三十四年间,仪式的基本框架虽有繁简之分,但并无太大出入。尽管早期史料对其所作描述仅止只言片语,但并非表明天地会的结盟仪式真的如此简单草率。这种笼而统之的记载多起因于被俘会众的有意隐瞒。随着天地会反抗统治秩序行动的增多,清政府彻底追查其起源及组织内幕的决心的增强,以及天地会成员对其会中机密缄默意识的降低,从而使有关史料中的记载与描述逐渐趋于详尽全面起来。从中我们不难勾勒出天地会结盟仪式的主要脉络,即排设香案一钻刀设誓一歃血为盟一传授指诀、诗句及暗号。

进入嘉道年间,由于天地会传播区域的日益扩大及其支派会众的日益增多,天地会结盟仪式亦随之日益繁复,彼此间的差异也多有显现。然而,其中大多数仅止是在上述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加以细节上的调整补充,并无本质变化。惟有一例值得注意,即道光二年(1822)江西大庚县三点会会内规定:"如得受合同,钻桥饮酒,即可自行传徒;如未获受合同,所纠之人仍作伊师之徒,得钱均分;如仅止钻桥,未歃血酒,不准纠徒分钱。遇打降等事,可邀同会人帮助;若仅传口诀,并未钻桥者,只能免同会人欺侮"。〔15〕这说明与以前相比,天地会的入会仪式已出现了等级之分,入会仪式的繁简,决定了入会者等级和权限。

与嘉道年间天地会结盟仪式中香案的陈设相对照,可知乾隆朝时较为简单笼统,能够见到

的记录多为“设立香案”四字，稍详细的也只是上放木斗、香炉，“排列牲醴香烛”而已，〔16〕所奉神明亦无明确记载。而嘉道朝以后，部分地区的结会仪式的陈设品日趋丰富，且香火的享受者也多有不同。如嘉庆十一年(1806)，由福建传入江西的天地会(三点会)结盟时，“供设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17〕嘉庆十三年(1808)，广西容县天地会结拜时需“写立已故二房祖师方大洪牌位”，而岑溪县则“写立已故长房祖师蔡德忠牌位”，“焚香礼拜，俱称系会中神道。即洪启胜、吴天成、吴德蒂、李色开等四人，亦俱系会中供奉之神，称为先贤”。〔18〕嘉庆十八年(1813)，江西添弟会结会，“设立供桌神牌，中写太上老君，旁写紫微三官”。〔19〕嘉庆二十年(1815)，福建侯二八雄复兴双刀会，“排列神桌，供奉观音并土地牌位”。〔20〕同年，前往广西恭城县做买卖的湖南人李泳怀加入该地广东人梁老三的忠义会，“梁老三摆设案桌，用红纸写忠义堂三字，粘贴桌边。又供设关帝神位，旁插纸旗五面，并点油灯数盏”。〔21〕道光十年(1830)，云南天地会结盟时，“用竹桩数根钉于地上，安放簸箕一个，写供五祖牌位，以便对神拜盟”。〔22〕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天地会结拜时，“搭方桌高台，安设木斗，内供始祖洪起胜、太子洪英牌位”。〔23〕从中可知，早期天地会在信仰方面与中国下层民众多神崇拜这一传统并无二致，既有道教的太上老君、天官、地官、水官、关帝，佛教的观音菩萨，又有洪二和尚提喜、五祖、明太子朱洪英等天地会的创始者和传说人物。

除上述拜神牌位外，供桌上还另有许多五花八门的陈设物。乾隆六十年(1795)台湾施兰拜会，仅在米斗中盛米并插两把半斩刀，而嘉庆七年(1802)广东新会县郑嗣韬拜会，则“用木斗一个，斗内插五色纸旗五面，上写日月清风令五字。又插剑二口，剪刀、尺各一把，铜镜一面，置放桌上”。〔24〕嘉庆十一年(1806)，福建晋江添弟会结拜时所搭神桌，“中放米斗，七星灯，并剪刀、镜尺、铁尺、尖刀及五色布各物”。而嘉庆十九年(1814)福建长汀的拜香会，则在神桌上“杂陈香烛、牲米、刀棍、戥子、算盘、镜、尺各件”。〔25〕这些表面上杂乱无章、稀奇古怪的东西，作为天地会中神秘的法器，频频出现在其结盟仪式的供桌之上，各自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其含义将于后文论述)。正是这种充满神秘力量及含义的陈设物，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天地会的结盟仪式的神圣性，且加强了入会者所立誓言的约束力。

此外，乾隆年间天地会结盟仪式中常见的钻刀设誓，于嘉道年间除沿用其基本形式外，各地天地会又赋予了它多种变化。

如“钻布桥”：嘉庆十一年(1806)，福建永定县卢盛海传会时，“用蓝布、白布各一段，搭放两边椅背，作为布桥，又将红布一块用秤钩挂在桥上”，令入会者分别从“桥”下钻过，同时“卢盛海口诵俚词，以伸信誓”。〔26〕

“钻神桌”：嘉庆十四年(1809)，福建长汀县天地会的新成员在结盟仪式上须由神桌下钻过，立誓相互帮助。〔27〕

“跳火坑、钻刀”：嘉庆十六年(1811)，客居并来往于广西、云南两省的广东人结拜天地会，设案供奉五祖牌位，“桌上插刀两把，地挖火坑，令入会之人俱从火坑跳过，由刀下钻入，至牌前盟誓”。〔28〕而另一批在广西客居的广东人结拜忠义会，则跳过火盆，“名为过火焰山”。〔29〕

“过三关”：嘉庆二十一年(1816)，客居贵州兴义府的福建人严老三、严老五与广东人麦青邀人结拜添弟会，“用竹扎关门三层，每关两人各执长尖刀立于两边，将刀架在中间，又于关门内搭一高台，上设木斗，内安洪英等牌位五个，并五色纸旗五面，尺一把，秤一杆，剑一把，镜子一面，中插红布帅字旗一杆。严老五站立头关，刘老九立在二关，严老三在第三关内，披发仗剑，站在台上。入会各犯俱拆散发辫，用红布包头，先由头二关报名，从刀下钻过，再进第三关，至严

老三前盟誓，说定有事俱要舍命相助，不许翻悔畏避。各刺中指，滴血饮酒，一齐磕头结拜弟兄，将众人姓名开列盟单焚化，均由火上跳过，以示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30〕道光十五年(1835)，贵州古州厅添弟会则“用竹片扎成关门三层，第一层为水关，第二层为火关，以示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第三层关门供奉洪起胜、太子洪英牌位，桌上安设木斗，点七星灯一盏，插五色纸旗二十五杆，黄纸伞一柄，红纸帅字旗一杆，旁扎草人一个”。入会者“俱从关门钻进，各将草人刀砍一下，日后有事不来帮助，即照草人一样受刀，叩头盟誓”。〔31〕

“过三洞”：嘉庆二十四年(1819)，广西灌阳县天地会的结盟仪式被发现，据称该会结拜之外“设篾拱门层，每层左右各一人，手执顺刀、铁尺，门下放水一盆，燃信香三炷，令入者俯伏跪下，手执信香投入水盆内盟誓。如不跪、不盟誓，即以铁尺击背，刀架于颈，示杀之状。二层、三层亦如之，名曰过三洞”。〔32〕

经过上述一系列仪式之后，入会者便可习得天地会秘诀、诗句及暗号。这些更因时因地，增新添异，繁简不一。乾隆年间最为常见的“三指诀”，至嘉道年间发展为“开口本，出手三”〔33〕或“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34〕暗号。即称自己姓氏时，必言本姓×，改(或现)姓洪，接茶取物俱用三指。除此之外，会内成员在外相遇时的识别器物及暗语对答更是丰富多彩。有“用铜钱一个，凿痕两道，挂在胸前为号”者；〔35〕有“用红布带系裤，作为暗号”者；〔36〕有“出门各将项下钮扣解开，衣向内折斜肩，雨伞将柄向上，可使同会之人一见而知，互相照应”者；〔37〕有“每日上午发辫自右盘左，下午自左盘右，胸前钮扣解开两颗折入襟内，以为同会暗号”者；〔38〕有“传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又问从哪里来？哪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从哪里过？答称：桥下过。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者；〔39〕有以“丁山脚下”为会中口号，“如有人问吃什么水？答以丁山脚下三河水”者。〔40〕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天地会结盟仪式的象征意义

伴随着天地会的创立与传播，其结盟仪式也在由简而繁地不断得到完善。之所以举行结盟仪式，“是为了使入会者产生一种神秘感，以便入会后在行动上，能够自我约束，保守会内机密，忠于誓言，听从首领指挥，彼此间互相帮助，共同自卫抗暴”。〔41〕这种产生于结盟仪式的神秘感，类似于宗教礼仪所达到的精神效果，同样都来源于符号化的象征手段。它通过一套严格规定的程式，显示其神圣性和庄严性，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极为严肃敬穆的气氛。这种象征性和活动方式，具有高度符号化、规范化和理想化的象征意义。〔42〕天地会结盟仪式所表现的符号化象征手段，主要是香案上的摆设物、钻刀仪式及歃血盟誓三个方面。

总观天地会结盟仪式所摆放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有香炉、牲醴、木斗、剑或刀、剪、尺、镜、灯、戥子、算盘等。香炉用以焚香。中国自周代始即将萧、蕙等香草含以黍稷焚烧，认为其香气可使神灵降临。汉代，随着西域及南方交通的展开，香料涌入中国，烧香作为一种风习逐渐固定下来。另外，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对烧香风习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焚香的意义由其所发的香味、上升的青烟及灼热的火三要素组成。古人认为，那袅袅上升的青烟可通神，而其醉人的香气可避邪。故而焚香派生出了通神、降神、驱鬼、避邪、逐疫等多种功效，〔43〕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仪式中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牲醴，即牺牲与甜酒。牺牲指马、牛、羊、鸡、犬、豕等牧畜，是祭祀中最关键的供品。使用牲畜和酒祭祀，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存在的大量卜辞及《周礼》中都多有记载。与焚香相同，饮酒、

食肉、闻香俱为人之所好，推己及神，自然神灵也被赋予了与人相同的欲望及爱好。人们通过献上神所喜好的供品取悦于神，表达虔诚、敬畏和意愿，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属于物象礼仪，即“以物的形式向神祭献的宗教礼仪行为”。〔44〕

此外，天地会结盟仪式中所使用的木斗、剑或刀、剪、尺、镜、灯、秤或戥子、算盘等物，又无一不带有其神圣的象征意义，其中以木斗最为玄妙。天地会拜盟时往往将五色小旗及上述器物插入盛米木斗之中，这一作法与道教的“改年拜斗”科仪极为相似，人们为了改换运势、招财进宝，在玉皇庙中由道士主持，安放元神亭和金狮、银象等十二大宝，元神亭中央置以剪刀、镜、秤、尺、灯，周围再配以形同十二地支动物的假人和十二支蜡烛。〔45〕斗为星辰之意，将小旗插入斗中，翁同文先生认为与中国古代占星术“木入斗”为皇帝得位之兆有关。据孙光宪《北梦琐言》称：“唯斗为帝王之宫宿，唯木为福神”，“木星入斗，帝王之兆”。而天地会会场上的“旗斗”则具有此象征意义：旗杆为木，象征木星，插于斗上，象征入斗。以旗代木，很有可能是受宫殿、庙宇门前旗杆上的方斗，即旗科的启发。〔46〕这一推断很有道理。

作为插入斗中或杂陈斗旁神案之上的剑、刀、剪、尺、镜等物，俱为道教中的法器。剑代表着“道”的灵威，同时也是帝王权力的象征，具有斩杀恶灵，避邪驱鬼的功效。（刀、剪的功用亦在于此。）镜同样具有剑的威力与权威，且可用于识破妖邪的原形。剑与镜相配，成为道教中最具神秘力量的法器。斗、尺与秤或戥子，同为度量衡之具，古人认为，凡度量衡都具有避邪驱魔的威力。尺在道教中常被用来占卜吉凶祸福、避邪医病，其利用率仅次于斗。灯的使用则源于道教的灯仪。道家《灵宝玉鉴》认为，灯仪包含着“请光破幽”的意义。“死魂一堕重阴，漫漫长夜，非有阳光照烛，超出良难。故必法天象地，然灯告符”。所谓“法天象地”，就是灯坛的铺设，上法日月星辰之悬象，下布八卦九宫之方隅，以交接阳光，开明幽暗，使亡魂乘光得度。〔47〕

上述具有神秘力量的法器的使用，无疑说明了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信仰及道教科仪的影响，从而显现出一定的宗教色彩。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天地会绝非宗教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结社倾向的互济互助的团体，因此，其结盟仪式中的宗教因素势必被淡化。分析天地会《会簿》中有关剑、镜等神圣物的诗句，便可清楚地证明这一论点。

如“剑诗”：“双飞宝剑挂城呈，斩尽夭[妖]邪尽服明。兄弟若有结果日，一统江山尽大[太]平”。

“剪刀”：“云露濛濛不相同，金刀剪开万里洪。剪开云露观日月，青天早早降真龙”。

“秤诗”：“结兄把秤三尺长，秤过粮米二斤十三两。木杨城内招兄弟，万姓进朝保明王”。〔48〕

“镜诗”：“第一阴阳宝镜明，失落洪楼佛祖前。寺中照出天官相，百八年来剿灭清”。〔49〕

“尺诗”：“天下几宽地几长，鲁班玉尺万载量。广开天下分豪土，一统江山万古场”。

“戥诗”：“宝等[戥]天下分县[轻]重，洪兄心事一样同。故将宝等[戥]定中案，今[金]兰尽归我汉人”。

“算盘”：“小小算盘算天机，能算清朝灭几时。袖内八卦早算定，逢秋润[闰]八孰登基”。

“点灯诗”：“宝灯昔河[可]照九重，能照弟兄奸何[和]忠。有福同进玉金殿，同到金阶拜真龙”。〔50〕

显而易见，天地会结盟仪式所用的剑、镜、尺、秤等神圣物绝非原有意义上的道家法器，而是其神圣象征性的外延，即带有辨奸识伪、亡清兴明的新功用，其政治性远远超过了宗教性。

如前所述，秘密结社举行结盟仪式的意义在于使加入者告别自己的过去，获得前所未有、

与众不同的新的“生命”。关于这一过程，天地会一方面通过净身予以实现：“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51〕而更多的则是模拟“死亡”与“再生”。

“死亡”与“再生”观念的起源甚为久远，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古老的文明体系之中。太阳的东升西落，植物的盛衰枯荣，春夏秋冬的四季变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些都可以引发人类对自我生命的联想。埃及著名的奥西里斯复活神话，即是这一观念的最佳写照。奥西里斯是植物的生长与丰产的保护神，原为埃及之王，被其弟塞特设计谋杀，裂尸抛弃，他的妻子伊西斯为其收尸复仇，并使之复活。“死亡”与“再生”观念渗透到古代各种秘密仪式之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尤以各民族的成丁礼为最。成丁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其意义在于告别自己的童年（死）而被正式接纳为社会成员之一（再生）。例如西非的祖鲁族少年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便会受到族人的祝福，到一特殊的房间中隔离一段时间，然后取一新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传统社会，名字代表着那个人本身，象征着生命。因此，更改名字即意味着与目前的自我诀别而成为一个新人。〔52〕

中国古代贵族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53〕“礼”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而“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54〕“冠礼”则成为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仪式之一。古人冠礼由来宾主持，为及冠少年戴上“缁布冠”又称“玄冠”，即黑布冠；“皮弁冠”即武冠；“爵弁冠，”即文冠。同时，少年分别换上黑色、白色及红色的衣服。〔55〕三次授冠易服之后，来宾为少年取字，即所谓“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56〕“字”相当于新的名字，意味着新的生命。此后，及冠少年便作为成人正式跻身于社会之中。

上述冠礼所显示的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性，同样再现于天地会的结盟仪式之中。新加入者从交叉的刀剑中钻过以及诸如“钻布桥”、“钻神桌”、“过三关”、“过三洞”等，都暗示着与过去的诀别，经过死亡的考验而获新生。据记载，广西天地会主持拜会者称为“老母”，结拜时“筑盟台一所，奉五相（即五祖）为神，设台十数张，纵横如品字式。其头目披发持剑，趺坐台上，谓之老披。……其奪入台口者，谓老披为老母，己为老母所生，谓之出世”。〔57〕而广东则称主持拜会者为“亚妈”，此外在天地会会薄的诗句中亦多有“娘亲”、“娘妈”、“父母”、“老母”、“母亲”等称谓。据此，有关学者认为入会者钻入台口，意味着模仿母亲分娩，“天地会员之间虚拟的血缘兄弟关系通过统一假想的母亲分娩仪式而得到了加强”，故而加入天地会，就“意味着一个人新的生命开始”。〔58〕这种观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此外，天地会新的成员在入会之后，往往改姓为“洪”，有的甚至加上“金”字或“文”字排行，〔59〕这与古代冠礼的授“字”实为异曲同工。

天地会歃血为盟主要分为以鸡血入酒共饮及割破手指滴血入酒分饮盟誓两种。二者虽然形似，但却存在着一些差别。血在远古时代人们心中即具有非同寻常的神秘力量，是生命与活力的源泉。故而多作为供品奉献给神灵，既有牲血，亦有以人血祭神。而在盟誓礼仪中，则主要是杀牲歃血誓于神。所谓歃血，即与盟者各饮牲血一口，用以表示信用。人们认为歃血后如若背盟，则势必遭到神祸。天地会成员共饮鸡血酒歃血立誓，其含义重在发誓严守组织机密。而割指歃血者，除上述内涵外，尚有结拜异姓兄弟之意。每个人的血滴入酒中，同饮入腹，即形成了准血缘关系，维系了兄弟情义。故而后者比之前者，象征性意义更为深远。

综上所述，可知天地会在结盟仪式中，通过一系列符号化象征手段，使加盟者有意识地告别自己的过去而成为组织中的一员，形成并强化了保守会中机密、服从组织行为及思想规范的

约束力，从而极为有效地整合了处于秘密状态的结社团体。引人注目的是天地会结盟仪式所具有的上述象征意义，并非孤立的独特的现象，而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无独有偶，与中国天地会同样出现于十八世纪的西方共济会，其入会仪式即与天地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共济会(Freemason)作为西方社会最为重要的秘密结社之一，正式出现于 1717 年 6 月 24 日(圣约翰日)英国伦敦。与扑朔迷离的天地会起源相同，关于共济会的起源亦众说纷纭，有"所罗门神殿"起源说、古代密仪宗教起源说、毕达哥拉斯起源说、中世纪石匠行会起源说、圣堂骑士团起源说等等。该会受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精神影响，在互济互助的基础上，主张追求超越阶级、国籍、宗教差异的博爱、进步、和平与幸福。在其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共济会迅速从英国发展到法国、德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及美国，其成员包括各国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等广泛阶层，在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战争中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入共济会必须是年满二十岁以上的健壮的青年男子(王族为十八岁以上)，需经两名正式会员推荐，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方可入会。该会分"徒弟"、"工匠"、"师傅"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各自的加盟仪式。其含义在于"徒弟"等级是自我净化的准备阶段；"工匠"等级意味着进一步加深旨在自我净化的修炼，寻求智慧及情绪上的充实；"师傅"等级为在智慧及情操方面已臻成熟的会员，通过克服死亡达到精神上的觉醒。三者的加盟仪式大同小异，以最初级的"徒弟"等级入会仪式为例，志愿者被蒙双眼领入会场，发誓决不对外泄露所知的一切有关入会仪式的秘密。随后，志愿者被导入一充满剑尖的房间，并躺在象征棺材的图案之上，身上盖布，与会的正式会员各以佩剑指向其身。经过这番象征着黑暗、恐怖的死亡之旅的考验之后，志愿者获得"再生"，从此成为共济会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会场之中尚有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器物。如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及"生、死、光"等三位一体说的等腰三角形；代表"神目"的独眼图案；象征事物相对性的圆规以及象征世界从混沌转为秩序化的直角尺；中间有一"G"字的闪光的星星图案，这个"G"字是引力、几何学、生殖、天才、灵知五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同时也意味着神(God)—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家。〔60〕

显而易见，成年男子的结社团体、严守机密的誓约、由"死亡"至"再生"的象征性仪式、以及借助符号化的象征手段，这些都是天地会与共济会的结盟仪式所共同拥有的特点。天地会与共济会两大秘密结社，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各自的思想观念、组织系统、生存环境和发展历史。然而，二者作为缤纷多彩的人类社会的诸般表象之一，在其深层结构所显现的符号化象征手段方面，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二者的结盟仪式所采用的规范化行为及其象征意义的一致性上。虽然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但天地会与共济会结盟仪式的这种内在联系，却是有目共睹的。十八世纪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而言，都无疑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中国虽在总结和继承以往历史的基础上迎来了其高峰，同时又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然而与发生了产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西方社会相比，却悲哀地丧失了以往的辉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日益扩大的时代中，二者社会几乎同时出现了具有许多类似之处的两大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与共济会。或许这恰恰反映了人类不同文化体系间尽管有着诸多的差异，但在各自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却存在着可以相互勾通和理解的共性。

---

〔1〕[日]绫部恒雄《秘密の人类学》アカデミア出版社 1988.9 第 11 页

〔2〕参阅[日]吉村正和〈フリーメイソンの起源〉《歴史読本》特别增刊 94 号

〔3〕军机处录副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折 载《天地会》(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11 第70页
〔4〕外纪簿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朱批 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联折 载《天地会》(七) 第524页
〔5〕军机处录副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闽浙总督崔应阶折 载《天地会》(七) 第528－529页
〔6〕《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六十一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闽浙总督李侍尧折 载《天地会》(一) 第104页
〔7〕台湾档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大学士和珅折 载《天地会》(一) 第111页
〔8〕《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八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福康安、鄂辉同联折 载《天地会》(一) 第97页
〔9〕军机处录副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孙士毅折 载《天地会》(一) 第69－72页
〔10〕军机处录副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孙士毅、图萨布联折 载《天地会》(一) 第85－87页
〔11〕军机处录副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万钟杰、奎林联折 载《天地会》(五) 第376－377页
〔12〕军机处录副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 奎林、万钟杰联折 载《天地会》(五) 第383页
〔13〕《天地会》(一) 第161页
〔14〕军机处录副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日 哈当阿、刘大懿联折 载《天地会》(六)第50页
〔15〕军机处录副 道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江西巡抚程含章折 载《天地会》(六)第386页
〔16〕外纪簿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七日朱批 哈当阿、杨廷理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3页
〔17〕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折 载《天地会》(六) 第301页
〔18〕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崶联折载《天地会》(七) 第261页
〔19〕军机处录副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两广总督百龄、江西巡抚阮元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359页
〔20〕军机处录副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 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212页
〔21〕宫中朱批 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湖南巡抚巴哈布折 载《天地会》(七) 第369页
〔22〕宫中朱批 道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联折载《天地会》(七) 第504页
〔23〕军机处录副 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贵州巡抚嵩溥折 载《天地会》(七)第486页
〔24〕军机处录副 嘉庆七年九月二十日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433页
〔25〕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 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187、189页
〔26〕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江西巡抚先福折 载《天地会》(六) 第301页
从其它天地会组织的钻桥仪式中可知，卢盛海所诵词句应为“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江西巡抚先福折 载《天地会》(六) 第332页〕
〔27〕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福建巡抚张师诚折 载《天地会》(六)第171页
〔28〕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云贵总督伯麟、云南巡抚孙玉庭联折 载《天地会》(七) 第427页
〔29〕军机处录副 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湖南巡抚巴哈布折 载《天地会》(七) 第369页
〔30〕宫中朱批 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折 载《天地会》(七)第450页
〔31〕宫中朱批 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贵州巡抚裕泰折 载《天地会》(七)第517页
〔32〕军机处录副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内阁侍读学士卿祖培奏折付呈单载《天地会》(七) 第375－376页
〔33〕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先福折 载《天地会》(六)第184页
〔34〕军机处录副 嘉庆七年九月二十日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433页
〔35〕军机处录副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朱批哈当阿、刘大懿联折 载《天地会》(六) 第49页
〔36〕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汪志伊折 载《天地会》(六) 第195页
〔37〕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恩长折 载《天地会》(七)第187－188页
〔38〕宫中朱批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顶联折载《天地会》(六) 第238页
〔39〕军机处录副 嘉庆二十年二月三十日福建巡抚王绍兰折 载《天地会》(六)第216页

〔40〕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崶联折载《天地会》(七) 第 262 页
〔41〕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7 第 143 页
〔42〕参见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9 第 130 页
〔43〕参见[日]《道教事典》平河出版社 1994.3"烧香"条
〔44〕《宗教社会学通论》第 130 页
〔45〕参见[日]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道教》第一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6 第 160－161 页
〔46〕参阅翁同文《天地会隐语"木立斗世"新义》载台湾《史学汇刊》第七期
〔47〕陈耀庭、刘仲宇《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12 第 136 页
〔48〕军机处录副 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发广西巡抚成林呈军机处咨文所付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藏《会簿》载《天地会》(一) 第 18 页
〔49〕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 1986.7 第 51 页
〔50〕《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5 第 501、504 页
〔51〕[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8 第 137－138 页
〔52〕[日]绫部恒雄著《秘密の人類学》第 27 页
〔53〕《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内则〉
〔54〕《礼记正义》卷六十一〈冠义第四十三〉
〔55〕《仪礼注疏》卷二
〔56〕《礼记正议》卷六十一〈冠义第四十三〉
〔57〕民国《邕宁县志》卷三十四 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3 第 82 页
〔58〕同上书 第 83 页
〔59〕宫中朱批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阿林保折 载《天地会》(六)第 294 页
〔60〕参阅[日]绫部恒雄《秘密の人类学》、吉村正和〈フリーメイソンの起源〉

(上接第 118 页)
②⑤⑳㉓㉕㉙《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P388－389, P407, P387－389, P396, P20, P407。
③⑥⑦㉗㉚《The Rise of Modern China》P148－149, P150, P150, P149, P150。
④⑬《The goloden Age of China Trade》P68, P85。
⑧⑨⑩⑫⑮㊳《Strange Company》P105, P130, P123－146, P146, P147－150, P132。
⑪《瓷器与荷中贸易》P44。
⑭《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P9。
⑯《欧洲经济史》(奇波拉主编)P365
⑰㉔《资本论》第 1 卷, P819, P819。
⑱⑲㉒㉖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P4, P9, 15, P18－20, P11, P11。
㉑《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766)》P30, P44。
㉛㉜《皇朝政典类纂》卷 118, P3757, P3751。
㉝㊱㊴㊵《粤海关志》卷 26, P23, 卷 27, P7; 卷 24, P4; 卷 18, P1; 卷 24, P5。
㉞《(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20, P3－4。
㊲《清圣祖实录》卷 277, P719。
㊶《清高宗实录》卷 237, P53。